

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丛书主编 / 何志龙

为君之道

先秦诸子领导理论研究

柴永昌 / 著

 科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丛书主编 / 何志龙

为君之道

——先秦诸子领导理论研究

柴永昌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先秦诸子对“为君之道”的论述为切入点,围绕领导起源与作用、领导职能、领导价值、领导体制、领导素养等一系列有关领导的根本问题,对老子、孔子、墨子、慎到、商鞅、孟子、荀子、韩非子、申不害以及《孙子兵法》、《吕氏春秋》、《大学》、《管子》“君臣篇”等的领导理论进行了较为细致、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深入揭示了先秦诸子对领导本质以及领导规律的认识。通过对先秦诸子领导理论的分析阐释,对进一步深入解读先秦诸子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帮助一般读者和管理者增进对领导现象和领导活动的思考与理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君之道:先秦诸子领导理论研究 / 柴永昌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9
(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ISBN 978-7-03-049887-8

I. ①为… II. ①柴… III. ①领导思想—思想评论—中国—先秦时代 IV. ①C933.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7506 号

责任编辑: 陈 亮 范鹏伟/责任校对: 张小霞

责任印制: 张 倩/封面设计: 黄华斌

编辑部电话: 010-64026975

E-mail: chenliang@mail.sciencep.com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9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9 3/4

字数: 310 000

POD 定价: 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丛书总序

在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是一般教师关注的主要对象,教师们不仅关注自身的教学与科研,也关注他人的教学与科研,但对于学校和学院,高度关注的则是学科,即我们通常讲的学科建设。所谓学科建设,一般包含学科平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学科平台建设,主要指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设置和建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设置和建设,另外也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设置和建设,以及其他各类研究平台的设置和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主要指师资队伍规模、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等方面。科学研究,主要指师资队伍成员从事学术研究所产出并公开发表和出版的学术论文、著作以及研究报告等。人才培养,主要指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所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质量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和社会各行业的影响。学科建设的四个方面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学科建设的有机整体。其中,学科平台是基础,有了学科平台,有利于引进人才和加强队伍建设,有了学科平台,才能招收研究生,进行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是核心,拥有一支合理的师资队伍,才能支撑和维持学科平台,才能有进行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主体。科学研究是关键,科学研究的成果体现学科平台的力量,也是培养人才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人才培养是目标,人才培养必须依托学科平台,同时,人才培养不仅必须要有师资队伍,而且必须要有具备科学研究能力的师资队伍,才能完成合格的人才培养。

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历史学科一样,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建设,在2012年之前,主要进行的是学科的外延建设。所谓外延建设,就是指增加学科的数量和规模,如拥有几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几个国家重点学科以及几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综合国力的



增强，民众对高等教育有更高期待，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发展道路，高校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学科建设的重点由外延建设转向内涵建设。外延建设主要强调量，而内涵建设则更加注重质，外延建设为内涵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已有学科平台的基础上，凝练高水平的队伍，产出高水平的成果，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将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而统领这三方面的正是学科特色。凡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大学的特色集中体现在学科特色上。所谓学科特色，主要指在某一学科的某一领域，凝练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团队，产出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同时培养出一批在学术界和相关行业有影响的人才。为什么说学科特色是学科内涵建设的灵魂，原因有三：一是从人力资源配置看，很难有一个高校有能力支撑一个学科（一级学科）所包含的所有学科领域。二是从财物资源配置看，很难有一个高校有能力支持一个学科（一级学科）所包含的所有学科领域发展所需要的财力和物力。支持学科建设不仅要有研究团队，而且要有为研究团队提供从事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财力和物力，如从事历史学研究所必需的场所设施、网络环境和图书资料等，只有满足人、财、物的合理配置，才能进行科学研究。三是只有发展学科特色，资源配置才能实现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如果学科领域广泛，需要配置的文献资源也必然广泛，相应地如果学科领域相对集中，需要配置的文献资源也相对集中，成本低而利用率高。另外，发展学科特色，易于承传学术传统，易于形成内部合作，易于产出系列成果，易于团队培养人才，易于形成学术影响，也易于保持学术影响。

发展学科特色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作为历史学科建设，要充分考虑地方历史文化，形成自己的学科优势，这种优势既能更好地服务地方，也能充分彰显自己的学科特色。要注重已有学术传统，顺应国家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着眼未来，长远规划学科特色。要充分考虑学校的实力地位，谋划学校能够实现的规划，因为学科建设规划只有在人、财、物的可持续投入基础上才能实现。

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依托地处周秦汉唐历史文化中心，考古资源丰富，出土文物规格高和数量大的优势，经过几代历史人 70 多年的不懈努力，逐步形成了以周秦汉唐历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科特色，中国古代史国家重点学科的获批，也是对这一学科特色的充分肯定。随着国家对历史学科精细化分类管理，原来既是门类也是一级学科的历史学一分为三，调整为中国史、世界史、



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根据学校地位的变化和学校对历史学科人、财、物的持续投入状况,面对三个一级学科的评估和建设,在国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思路必须明确,决策必须正确,行动必须快捷。环顾国内外高等院校学科建设成功者,无不具有显著特色。我们在学科内涵建设中,特色发展是唯一选择。作为中国史一级学科,其统属的中国古代史和历史地理学两个国家重点学科,是我校的特色学科,也是我校的优势学科,在国内学科建设的激烈竞争中,只有加大建设力度,才能保持优势地位。而要保持传统优势学科的地位,除了加大已有建设的力度,还必须不断探索新的学科增长点,才能进一步强化学科优势,彰显学科特色。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发展的大战略,为地处丝绸之路起点的我校历史学科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学院“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不仅顺应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同时也是我院探索新的学科增长点的体现。中国史升格为一级学科后,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势在必行,而从时间和空间上看,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样极为广泛,我们也必须选择某一领域,重点建设,特色发展。西北地区的近现代史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西北地区的近现代史作为我校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方向,同样具有明显的地域优势,也必将成为我校的学科特色和新亮点。

此外,文物与博物馆学也是学院谋求学科建设发展特色的一大发力点。2008年1月23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根据该通知,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全部实行免费开放,博物馆已成为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基地。在全国范围内,博物馆如雨后春笋,发展迅猛,但博物馆学的专业人才却明显不足,这就为高等院校博物馆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陕西是考古大省、文物大省,更是博物馆大省,博物馆的人才需求也相对较大。基于地缘优势和省内学科建设差异化发展的思路,我校在考古学学科下重点发展博物馆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陕西省文物局与我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国家文物局在我校设立文博人才培训示范基地,充分说明我校重点发展博物馆学符合陕西省和国家对博物馆人才培养的需求,特色建设博物馆学的思路得到了肯定和支持。我们将在国内博物馆学研究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吸收国外博物馆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探



索努力构建我国博物馆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彰显我校博物馆学的学科特色。

彰显学科特色的要素很多，但产出颇具影响的系列研究成果尤为重要。为此，学院设计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本丛书首批 17 本，均为学院教师近年新作，每本书的内容不少于三编，作者自序。丛书的内容广泛，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希望通过出版本套丛书，集中展现学院教师近年来学术关注的领域和成就。鉴于本丛书是在我校大力推进一流学科建设的开启之年规划完成的，故以一流学科建设的思路代为本套丛书之总序。

何志龙

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文汇楼 C 段 209 室

2015 年 12 月 25 日



前言

在人类最开始的集体活动中，群体要完成一定的共同目标，就必须有承担解决分歧、决定战略和时机、维持各种行为和关系的组织工作的角色^①。马克思说：“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② 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说，铁路运转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动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③。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群体劳动和社会群体的各类活动都必然产生指挥协调的领导活动，领导者的一定领导权威对任何形态下的任何群体活动都是必要的、普遍的、永恒的。……领导产生和领导权威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发

① 著名的管理思想史家丹尼尔·A. 雷恩说：“在最早出现的组织中，其主要轮廓基本上体现了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共同元素。第一，必须存在一个目标，或者需要完成的某件事情。……第二，人们必须受该目标或共同意愿吸引，愿意参与进来。……第三，组织成员需要使用某些东西来进行工作或战斗。……第四，组织成员的各种活动必须是有组织的，他们相互作用、协调一致以实现共同的目标。……最后，这个群体发现，如果能让某个人专门负责带领整个群体朝向既定目标前进，效果会更好。为了实现目标，必须有人来承担这样的工作：解决意见分歧，决定战略和时机，维持各种行为和关系的组织工作。在这里出现的管理活动与具体工作活动相分离的局面，成为各种类型的合作努力中至关重要的部分。管理作为一种活动一直存在，其目的是使人们的愿望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得以实现。管理能够促进成员的努力水平，当人们通过寻求合作来实现目标时，管理便会出现。”（美）丹尼尔·A. 雷恩、阿瑟·G. 贝德安等：《管理思想史》（第六版），孙建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展的要求^①。在政治学研究领域这几乎是一种共识。莫里斯·迪韦尔热说：“即使自称最平等的集体也总是有一位或几位事实上的领袖。”^② 罗素也说：“大多数的集体事业，只有在某种管理机构的指导下才有实现的可能。……集体事业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一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服从命令。”^③ 现代领导学一般认为，领导现象伴随着人类的始终，领导活动（而非一般的管理活动）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在任何组织中，领导活动都是驾驭组织的活动，它对各种组织（大到国家、小到微型企业）的成败兴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④。可以说，领导活动是随着人类社会产生即存在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的重要文化现象。在我国，很早就有关于人类领导现象和领导活动的思考和记录。田广清等著《中国领导思想史》说：“中国在领导与管理理论方面发轫之早、造诣之深、贡献之卓越，世界各国罕有其匹者。现代领导科学和管理科学的许多基本原理，都可以从中国领导思想史找到源头。它不仅在理论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在实践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国至少从有文字的时代起，就有了领导思想。中国至少从先秦起，就已经把领导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了。”^⑤ 先秦诸子对领导现象和领导活动形成了系统、深刻的看法，先秦诸子时期是中国古代领导理论繁荣发展的关键时期。

二

先秦诸子领导理论的繁荣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首先，传统关于构建社会秩序的思路是先秦诸子领导理论发达的历史文化根源。刘泽华在论述商代的王权专制思想时说“王的确拥有至上的权力”，“‘余一人’处于承天继祖救民的位置”，“事业成功和功德在‘余一人’，那里治理不好，自然也应由‘一人’承当。所以又说：‘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⑥

① 何孝瑛主编：《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页。

② （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07页。

③ （英）勃兰特·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页。

④ 王雪峰：《领导学学科体系·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⑤ 田广清等：《中国领导思想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⑥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4页。

在“小邦周”取代商王的统治以后，统治者对夏、商之兴亡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和总结，提出“天命靡常”的观点，认为君主只有“敬德”、“明德”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才能为民之“主”。春秋时期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化，“臣弑君”、“子弑父”的事情时有发生，有识之士仍旧把国家乱亡的原因归结于君主自身^①。既然天下、国家兴亡的根本在于君主（天子、王、诸侯国君），那么，解决社会治乱问题，恢复国家天下秩序，围绕君主进行探讨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这种对社会治乱的认识和解决社会治乱问题的思路就成为后来诸子思考这一问题的基点。先秦诸子普遍认为有统一的最高的权力中心——“君主”的存在是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内在需要。张分田在总结先秦诸子关于立君的各种理论时说：“尽管不同学派的思想家论证方式与强调点有所不同，而君主为秩序而设则是人们的共识。简言之，无君无以为治。”^②刘泽华同样说：“中国古代各家各派，从不同角度出發，几乎一致认为君主在国家治乱中有决定性的作用。”^③先秦诸子关于君主是治乱的根本的论述，非常之多^④。君主既然在社会治乱中发挥关键作用，那么，要解决社会秩序问题，即“治道”问题，势必会集中在对“为君之道”问题的讨论上。徐复观说：“中国圣贤一追溯到政治的根本问题，便首先不能不把作为‘权原’的人君加以合理的安顿，而中国过去所谈的治道，归根到底便是君道。”^⑤可以说，君王在治乱兴衰中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这一很早就形成的有关社会治乱问题的“共识”在先秦诸子身上得到延续，通过讲“为君之道”进而为社会秩序重建提供理论支撑就成为先秦思想发展的重要逻辑！而先秦诸子对领导现象和领导活动的思考就主要包含在对“为君之道”的阐发中。

其次，社会巨变强化人们对领导现象和领导活动的思考。西周末期王权逐渐衰微，周初建立的宗法封建秩序遭到破坏。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诸侯争霸，王权进一步衰微，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次大变动时期，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剧烈变

① 柴永昌：《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君道论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34、35页。

② 张分田：《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93页。

③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④ 柴永昌：《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君道论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7、8页脚注。

⑤ 徐复观：《中国的治道》，《学术与政治之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动，西周建立的宗法封建制度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郡县制、官僚制逐渐兴起，世官制度逐渐解体，原来靠宗法血缘维系的政治关系，不完全起作用了，有些靠不住了！同时，随着诸侯之间常年征伐，“大鱼吃小鱼”，诸侯国越来越少，诸侯国君统治的疆域越来越大，对君王而言，领导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实施对臣下、对社会的有效控制成为摆在君主面前的严重问题。在诸侯兼并战争过程中，小国如何生存，大国如何在兼并战争中进一步取得并巩固优势地位，进而实现“王天下”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军事实力问题，也需要领导体制、领导方法等的革新与适应。总之，社会变革一方面在冲破旧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开始产生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新制度。君主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构建政治秩序、社会秩序需要有适应新情况的必备领导“技能”^①。先秦诸子领导理论就是在君主为维护自身统治、实现更大统治目标的社会大变革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君主领导环境的变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领导理论为之服务，是领导理论得以发展繁荣的现实动因。

最后，“百家争鸣”的出现为先秦诸子领导理论繁荣提供了条件。春秋时期以来社会大变动，“官学”逐渐流向民间，思想异常活跃，“士”阶层出现，他们游走各方，宣扬自己的主张和学说，无形中促进了理论活动的繁荣。士人宣扬给国君的思想理论形形色色，其中不乏投机取巧者，但严肃的学者总是从自己信奉的学理出发，把帮助君主适应新形势、重建社会秩序、解民于倒悬作为其著作立说、游说进言的崇高而终极的目标。而由于传统的惯性，他们把治乱问题的根本归结于君主自身，探讨“为君之道”、为君主出谋划策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在“为君之道”的探讨中涉及一系列严肃的话题，比如为什么要有君主、君主怎样有效控制臣下，等等。一句话，怎样当领导的问题，成为诸子学说的重要内容。

总之，先秦诸子时期，领导问题受到特别关注，领导理论繁荣发展，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也受到来自社会客观环境的影响。

三

先秦诸子领导理论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产生发展的，因此研究

^① 《韩非子·功名》：“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因技能，则不急而自疾；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君主立功成名是由天时、人心、技能、势位等综合性因素造成的。



先秦诸子领导理论是深入解读当时社会思想的内在需要。当然，也因为先秦诸子思想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刘泽华《先秦诸子与统治者在政治上的自我认识》说：“从老子孔子开始，到秦统一，是中国历史上认识的一个全面飞跃时期。在二百多年的时间内，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思想家，犹如山峰争高一样，随着一个大师的出现，都把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场认识运动是空前的，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又是绝后的。这场认识运动的总结果，开拓了认识新领域，打开了新思路；把历史长期积累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上升为理论，为古代华夏族提供了思维模式；……这个时期的认识的总合奠定了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① 先秦诸子时期无疑是中国思想发展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创造的思想理论成为后世思想发展与革新必定要回望、汲取营养的重要源头。研究先秦诸子的大家罗根泽曾说他特别喜欢周秦诸子是“爱其各明一义，不相沿袭”^②。先秦诸子不同派别展现出来的迥异理论风貌暂且不论，即使在同一派别内部如儒家之孟、荀，法家之商、韩，其各自理论也展现出相对丰富的独特内涵。如果从领导理论角度看，先秦诸子在领导问题思考论说上既有共识，也有区别，具有独特性、丰富性、原创性等特点，为后世所不及。特别是作为某一派别的奠基者，他所提出的观点和命题，为我们提供了考察领导现象和领导活动的理论范型。先秦诸子领导理论集中地展现了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智慧，从中我们不仅能够领略到中国古代领导理论的思想魅力，而且对于当前管理思想和领导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当然，对从事领导工作和要想锻炼提高领导力的人来说也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的管理智慧越来越受到重视，运用现代管理学知识、理论透视、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式和重要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③以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特别是先秦诸子的管理思想受到广泛关注，已有大量论著问世。在众多的中国管理思想通史和先秦诸子管理思想研究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先秦诸子领导思想相关问题。中国古代领导

①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70页。

② 罗根泽：《管子探源》，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7页。

③ 路宁的《近20年来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述评》（《高校社科动态》2006年第4期，第17—25页）一文将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发展历程分为三个时期。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零散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和中国管理思想史学科逐渐萌芽的时期”，“20世纪80—90年代，是系统性研究逐渐兴起和中国管理思想史学科正式创建时期”，“近5年来，是中国管理思想研究向纵深发展并日益走向成熟的时期”。



思想史作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研究起步之初就有专文问世。就笔者目力所及，到目前为止出版的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研究专著已有多部，如王海粟的《中国古代的领导艺术》、萧少秋主编的《中国领导思想史简编》、田广清主编的《中国领导思想史》、李锡炎主编的《中国古代、近代领导思想述评》、黄书光主编的《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探索》等，也出现了研究先秦诸子领导思想的专著，如曾宪年的《老子领导思想研究》、王成的《先秦诸子领导思想的现代解析》等，2000年后还出现了一些先秦诸子领导思想个案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包括先秦诸子领导思想在内的管理思想的研究呈现出进一步细化和繁荣的态势。

但是，目前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研究，包括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研究在内，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学者指出：

在目前的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中绝少上述考证。已出版的大多数著作或论文都是资料的堆砌，几乎没有考证，更谈不上梳理，研究根本没有区分各种资料的类型，资料的运用也成问题。……

当前一些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先假定一个总观点的存在，……然后再来搜集材料佐证之；或者不结合当时的背景，对一些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任意解释，得出绝大多数西方管理理论实际上中国早已有之的武断结论。

作者进而指出：

管理思想史研究者必须首先认识到我们的时代与所有以前的时代在时代背景上的巨大差别……离开时代条件和背景，就很难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进行客观、合理的解释。……

管理思想史尽管记录的不是事件而是思想，但也应该力求做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重视考证，更不能以主观价值来裁剪史料。^①

这些言论体现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笔者在阅读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研究论著的过程中时常感到：不少论著在撰写过程中不太注重第一手资料的鉴别，不少名为“管理思想史”或“领导思想史”的著作与一般

^① 吕力：《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对象、原则及存在的问题》，《管理学报》2010年第7期，第956—962页。



的政治思想史差不多,一些论著把古代思想资料当作素材着力发挥所谓的“现代启示”,一些论著明显存在胡乱引申发挥的倾向^①。总体来看,时下的中国古代管理、领导思想史研究现状与中国古代丰富而深刻的管理、领导思想实际是不相称的。在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领导思想研究,深入发掘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丰富内涵,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四

为尽可能避免目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研究领域存在的“任意解释”问题,本书并不企图直接从先秦诸子思想中寻找对当今领导实践的启示。笔者认为,如果仅想通过先秦诸子的思想材料发掘其对当今领导活动启示,就完全没有必要阅读、研究那些生活背景与我们迥异且深奥枯燥的诸子著作。因为,我们完全可从一部小说,比如从《红楼梦》就能挖掘对领导者的启示^②。甚至,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他完全可以因为读了一首诗进而领悟到对领导工作具有启发性的道理。也就是说,即使对领导活动没有任何明确论述的任何著述,不管是作为读者还是研究者,都可能从中获得指导自身领导活动的现实意义,也可能从中抽象出对于现代领导的诸多启示。比如葛荣晋从《韩非子》讲的“织者徙越”故事讲出“开发潜在市场”的道理,从“齐桓公服紫”故事讲出“名人效应”的道理,从《孙子兵法》讲的“避实击虚”讲出“寻求买点”的道理,从儒家讲的“为政以德”讲出“形象管理”的道理^③,等等,不一而足。这种讲法自有其价值和意义,但显然不是笔者所追求的思想史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先秦诸子对于领导现象、领导活动的认识和思考。先秦

① 例如,刘明非的《〈孙子兵法〉中的领导思想探微》(吉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该文第三部分讲《孙子兵法》的领导方法。作者将《孙子兵法》的领导方法其中之一概括为“选人用人方法”。但观察该部内容,并未援引《孙子兵法》中的相关材料,而是大量举例子,其中所讲选人用人之法,事实上在《孙子兵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证据”。

② 鲁迅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见鲁迅:《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77页)我们据此可以补充说:领导者看见领导的艺术。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③ 葛荣晋:《中国管理哲学导论》(第二版),第十五、十六、十七等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诸子对领导现象、领导活动的认识和思考则体现于他们对领导活动的具体论述中，这些关于领导现象、领导活动论述的命题就是先秦诸子的领导理论。笔者认为，如果要谈某家的领导理论，他就应当对领导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命题，对领导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论述，这是进行领导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每个人都有思想，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提出理论。这正是笔者将本书名为“领导理论研究”的原因所在。一旦我们能够找到诸子对领导活动的论述，分析其内涵，势必就会对理解和认识当下的领导活动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参考价值。

从领导学角度讲，领导者、被领导者、领导环境、领导目标等构成领导活动主要要素。领导者是整个领导活动的核心要素，是整个领导活动的设计者、指导者、推动者。没有领导者，就无所谓领导活动。先秦诸子普遍认为君主是国家、天下治乱的关键，显然是将领导者作为国家、天下治理的核心要素来考虑的。因此，从君道论角度探索诸子领导理论不仅符合先秦诸子思想实际，也符合现代领导学内在要求。有学者指出“领导理论是人类为了有效地实现改造自然和推进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围绕着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和社会矛盾，解决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矛盾，解决人群内部种种矛盾而展开的，进而形成领导思想的诸多内容。”^① 笔者所理解的“领导理论”是指：对领导产生、领导职能、领导价值、领导体制、领导激励、领导素养等一系列围绕领导者展开的带有根本性问题所作的理论说明。先秦诸子在对“为君之道”进行不同程度的系统论述过程中触及了这些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领导问题的命题，形成了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领导理论。以先秦诸子对领导活动的根本思考、论述为基础，以先秦诸子君道论为主要取材对象^②，是本书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不同于以往领导思想史研究著作的重要方面。

目前，管理思想史在学科划分上属于管理学的二级学科，但从性质上来说管理思想史属于思想史研究范畴，是历史学科研究的天然内容。但历史学科方面的学者往往不屑于从事这方面研究，或者说，由于学科不断分化，管理思想史这块领地被“管理学”抢占了。笔者认为，对先秦诸子领导思想史的研究，必须打通学科壁垒，充分借鉴中国思想史（包括政治思想史）、哲学史、文献学

① 何孝瑛主编：《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② 在这方面，《孙子兵法》是个例外，它主要讲的是“为将之道”而非“为君之道”。不过，从领导学角度审视，二者虽名义上有别，但精神上是相通的。



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现在不少论著之所以缺少科学性，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自说自话，不太重视，或不能有效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一些在思想史、哲学史上有争论的问题往往视而不见，完全按照己意进行阐释，这是有违历史研究的精神和原则的。笔者把对先秦诸子领导理论的研究定位为思想史研究。既然是历史研究，就必须对诸子文本中有关领导的命题和材料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只有如此才可能避免断章取义、歪曲文本、过度诠释等问题，也只有如此才可能达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领导思想史研究目的。

领导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过去有，现在也有。先秦诸子文本反映的思想内容距今两千多年，其言论思想背景与我们今天有很大差别。与两千多年前相比，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方式、技术水平、思想观念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领导价值取向和领导活动所依托的组织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先秦诸子领导理论的研究，一方面要靠“史料”自身说话，另一方面要借用现代话语阐释。如果不用现代观点和理论去看它，不用现代的语言去阐释它，先秦诸子说的很多话与我们现代生活对接不上，我们就无法读懂！因此，运用现代理论知识、语言分析先秦诸子的话语体系，既是先秦诸子思想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我们认识、理解先秦诸子思想的内在需要。有学者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弘扬传承它的观念，弘扬它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观点。如果不用现代思想观念与它对接，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用我们现在话语系统、语言框架分析过去的思想观念，既是研究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

五

先秦诸子提出的有关领导问题的理论观点，一些与现代领导学理念、精神是一致的，一些是不一致的。其中一些理论观点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失去其审视现实领导活动的理论解释力。笔者相信，通过对先秦诸子领导理论的分析阐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理解先秦诸子的思想观念，能够帮助一般读者和管理者增进对领导活动的思考与理解，能够帮助学者进一步理清中国古代领导理论发展变化的脉络！

在努力阐释先秦诸子有关领导问题的众多观点命题的时候，笔者越来越意识到任何历史人物的思想都有其历史性，先秦诸子也不能例外。先秦诸子普遍



将君主（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看得非常重，这与他们主张、拥护、论证君主独裁制度的思想是内在一致的，而这一点则是不符合现代社会追求民主领导的根本价值取向的。

笔者曾设想对先秦诸子的领导理论进行逐一梳理，一网打尽，但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越来越觉得不现实。以自己有限的学力要将现存诸子著作从“领导理论”角度梳理一遍难度太大，力不从心！笔者也曾设想写一本先秦领导思想史，没有多久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写“史”何其难也！要对先秦领导思想史的发生、发展进行系统的发掘阐释，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要对先秦诸子著作的年代进行定位，这一点就很困难。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个案”研究，以期在某一方面有所突破。在对某一家领导理论进行研究、撰写的时候，希望既能比较全面，又能凸显其特点。当然，这一点是否做到需要读者和时间来检验！